

纯正方言传孙辈 古诗为媒情更亲

■宋维远



近年，笔者经常听友人介绍，他利用假期跟孙辈中的小学生们一起逛公园、玩游戏，让儿童在跑跑跳跳中轻轻松松地学会用方言诵读古诗词，祖孙同学同乐，几年下来，也摸索出一些“读古诗，学方言”的小经验。

今年暑期快到了，儿童又将迎来快乐的假日，可以再跟爷爷奶奶小手牵大手，边玩边用方言诵读古诗词，享受“忆昔童孙小，曾蒙大母怜”和“含饴弄孙”的温馨，希望今年暑期有更多的爷爷奶奶与孙辈们参加到这个方阵中来，让方言得以保存、赓续，使儿童在学方言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滋养。笔者认为此举确是当今文化传承中值得点赞的好事，因而乐将友人的小经验简介于后，也算“读古诗，学方言”的小河里添几圈涟漪吧！而且期望借此得到方家的指教。

爷爷奶奶来辅导

学方言，本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读古诗词，却涉及格律、平仄、押韵等较为专业性的问题，属于学校老师和语言学、文学等领域里专家们的职责。但目前，却只有六七十岁的爷爷奶奶们才有资格来当辅导员，为什么呢？还得从现在的爷爷奶奶当初幼儿的时期讲起。

五六十年前，无论瑞安城底还是农村，大家讲的都是清一色的瑞安话。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党中央从山东派来一批老解放区的基层干部来瑞安充实乡村干部。他们讲的是普通话、山东话，瑞安群众听不懂，而瑞安话他们不会说，也不懂，交流沟通起来存在较大困难。乡、村开群众大会，如果是山东干部讲话，还要找人当“翻译”。尤其是平阳县（含现在的苍南县、龙港市）特别典型，开全县四级（县、区、乡、村）干部会议时，领导用普通话作报告，要有四个人分别作温州话、闽南话、“蛮”话、金乡话的“翻译”。我们瑞安农民到外地做工、经商、出差办事，也常遇到语言交流上的阻碍。于是当时在群众中大力推广普通话，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经过70多年的努力，尤其是扫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及业务兵在部队学文化、学普通话等，终于取得明显

在儿童普通话诵读中纠正自己普通话读错的字。

不过辅导员的任务也不轻，事先要“备课”，先翻阅儿童刚学过的语文课本中的古诗，里面如有几个词语，方言还读不准的，就要查一下《实用瑞安话》（庄中宝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瑞安方言读音字典》（张永恺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等书，或跟几位熟人在微信里打听一下。

瑞安的方言也由于村庄位置不同而稍有差异，某些小范围的方言读音尤其值得关注，例如湖岭、南滨、高楼等地出生的老人更应保留当地读音，而教孩子们读音则以现在所处的地方读音为宜。

还要给老人们提个醒：做这件事，不要急于求成，不贪多求全，不要强迫，以提高儿童兴趣为手段，始终把“学方言”定位为目的，做学校的助手。不要过早涉及语言学里的“学术内容”，只在辅导时利用浅显、具体例子介绍瑞安方言是专家探索我国唐宋时期语音的鲜活语言标本。在适当时机讲一些符合儿童年龄特征的方言民谚作补充，不布置任何作业，坚持让儿童在玩中学。

关注古诗词的句子节奏

用方言诵读古诗，跟普通话朗诵一

样，都要关注各种句式的节奏美，逐步提高儿童的审美情趣。

小学语文课本所选的古诗词，篇幅均以短小为主。古诗句式仍以五、七言为多。五言句式的节奏是“二字加三字”，后三字又可细分为“二一”与“一二”两类。如小学第二册语文课本中李白的《静夜思》，前两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是“二二一”结构，一句三拍，最后拍是一个字的词。接下去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二一二”结构，最后拍是二字的词或词组。

七言句式，中后五字和五言诗句式节奏相同，如小学第六册语文课本中杜牧的《清明》，前两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是“二二一二”结构，后五字和前述的五言“二一二”同类。接下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则是“二二二一”结构，后五字和前述的五言“二二一”同类。而诵读时两类句式节奏不要读成一样，否则容易把“地上霜”和“何处有”等读成“地——上霜”和“何——处有”，有碍内容的表达和理解。

词也一样，词中的五言、七言句，与诗的句式节奏同理，如小学第六册语文课本中白居易的《忆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辅导员要诱导儿童逐步加深，不断积累。

还有古诗词中的入声字，等读得较多的时候，有意识地抽出来，用普通话与方言两种读音让儿童慢慢对照品味。如小学语文课本第二、四、六册中出现了竹、月、雪、白等入声字，用方言读，都有相同的入声声调感。但在普通话里，竹字读zhú，成了阳平，月字读yuè，成了去声，雪字读xuě，成了上声，白字读bái，成了阳平。这是因为普通话把古代的入声字都分别改为阳平、上声、去声了，而用方言读还可把它读回到唐宋时的入声。

总之，要注意浅出、具体、多听、积累，以滴水穿石的坚持，使儿童入脑，保持方言中珍贵的特色。

“卦头对卦头，阿嫂养猪大如牛” 渐行渐远的乡村小曲艺

■虞秋生

岁月犹如一把杀猪刀，它无情地夺走人的青春容颜，更在悄然无声间重塑着乡村的文化脉络与传统习俗。那些曾给乡村生活带来欢声笑语的小曲艺，如“打卦”“送元宝”“打长筒”等，如今已悄然化作许多人心头难以割舍的乡愁，成为他们梦中萦绕的温柔回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在马屿高楼曹村一带，一些稍具说唱天赋的残障人或年迈体衰者，为了谋生，简短地拜师学艺后，单独或结伴，背着“行头”（即乐器与道具），有的还携带着简单的行李，穿行于各村落之间，敲打说唱，以此换取微薄的红包或口粮，这一行当，也被人称作“走江湖”。这种曲艺表演形式，简单易学，在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上，可能很乡土，却深受百姓喜爱。它不仅为农村这片广阔的文化舞台增添了一抹亮色，更在无形中解决了部分农村人群在就业和生活上的困境，为他们带来了希望和欢笑。

打卦

打卦，又称“打门头卦”，源自明末的乡村传统，而后逐渐演变成一种独特的“江湖技艺”，成为一些人在乡间谋生的方式。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这项技艺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打卦的人，有三对“卦杯”，是用水竹桩或木头做成，形如纺锤，被从中锯开，每一对“卦杯”钻有一个小孔，用细绳连结，使之成为一对。“卦杯”正面称阳面，背面称阴面。再配上一把小型关公刀，刀头固定在一条长约1米的小木棍上。这个“行头”结构简单，携带方便。

打卦的场合多种多样，无论是喜庆的娶亲出嫁、起屋上梁、年长祝寿，还是小孩满周岁的庆典，打卦者都能为人们带来欢乐，并收到一份红包。他们还会走村串户，以此讨要一些大米或番薯丝等粮食为生。

在打卦的过程中，打卦者会站在屋檐下，左脚踏在沿阶上，右脚则站在沿阶下。右手提着挂在关公刀上的三对“卦杯”，左手则将关公刀挂在沿阶石上，口中默念着神秘的词句，然后将“卦杯”抛向住户的门前。根据三对“卦杯”的俯仰和朝向情况，打卦者会即兴说唱几句吉祥的话语，为住户带来好运和祝

福。一般如下：

“3片阴，3片阳，曹操摆酒请云长，云长不吃曹操酒，拉起马头回乡”；
“卦头对卦头，阿嫂养猪大如牛”；
“卦尖对卦尖，大哥起屋连横杆”；
“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卦打千年福寿地，收起卦坛保太平”，等等。

有的打卦者还会询问主人家的姓氏，然后随口送上几句吉祥的话语。办喜事的给个小红包，平常人家会给点粮食。红包或粮食给多少由主人定，打卦者一般不会计较。

卦打完后，用关公刀的刀头（刀头带钩）将地上的“卦杯”钩起来，挂在刀把上，再去下一家。

送元宝

送元宝的最佳时间在农历正月初一至初十，其他时间也有，但相对较少。笔者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时常听到村里人讲：“这也好，那也好，正月初一送元宝。”

这种小曲艺，一般由2人搭档配合演出。一人在前，一人在后，前面的人双手端着元宝（不一定是银打制，很多是铅做的），说一句，后面的人搭腔紧跟一个“好”字。从门头头念起，一直念到主人家门头。富裕人家给几分钱，平常百姓给半块年糕、一把大米或

番薯丝干。如此这般，重复着一家一家走过去。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农村消失。

送元宝人常用说辞大致如下：

“好好，正月送元宝，好好，正月送元宝。
元宝送到东，代代儿孙做相公。好！
元宝送到西，代代儿孙胜神仙。好！
元宝伏一伏，代代儿孙起新屋。好！
元宝弯一弯，金银珠宝堆满间。好！
元宝扭一扭，主家养猪大如牛。好！
元宝笑一笑，代代儿孙中状元。好！”

打长筒

打长筒，或叫“唱道情”，也有叫莲花落。它的历史悠久，清代《珍珠塔》中，就有一节方卿唱道情羞姑的内容。这种小曲艺形式极具适应性，不仅能在红白喜事庄重场合中展现其魅力，也能在平凡的家庭聚会上轻吟浅唱，甚至登上乡村的舞台。当然，登台演出与日常的随意“走江湖”是不一样的，态度、内容和时间，都要严格地按主办方要求去做。

打长筒一般由两个人搭档说唱。一人左手持长筒握竹板，右手敲打长筒，率先起唱，另一个人则手握竹板，边打边接长筒人所唱的最后一个字，并附加如“哩啦哩呀”等。所唱曲目主要有《珍珠塔》中的“十不亲”“八仙”“高枝卖



打长筒 资料图

绢”“十喜”等。

如“十不亲”：

长筒人唱：“天地亲，不算亲，天地也会欺负人。”

竹板人接：“人暖，哩啦哩啊！”

长筒人唱：“想它下雨天天晴，想它晴天雨纷纷，六月太阳日晒死，冬天下雪冻穷人。”

竹板人接：“人呀，哩啦哩哩啦，催个旯用花。”

“朋友亲，不算亲，平时喝酒最认真，哪日困难需要你，一年半载不见人。”

“兄弟亲，不算亲，同胞手足把家分，你多我少不平均，背刀相打吓死人。”

……

一唱一接，内容可长可短，随机进行。长筒人心情好，或主人家有要求，那就多唱些，相反就简单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打长筒表演逐渐减少，艺人也不见了踪影。

习俗有更迭，增减都正常。乡村大舞台，正气当弘扬。农村富了，乡民对文化活动更渴求了，要求也更高了，欣赏方式和娱乐形式也悄然转变了，推出更多符合时代要求、紧贴农村实际、百姓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满足乡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该提上日程了。

陈葆善：

利济总理 医术高超

■马邦城



清光绪十一年（1885），在瑞城杨衙里（今公园路），近代著名的改良派思想家、中医学大师陈虬，首倡创办了全国第一所新式的中医学堂——利济医学堂。学堂实行校医一体，附设利济医院。当年的利济医家荟萃，陈虬的周围聚集着一批博学善医之士，其中最著名的当首推时任医院院兼总理的陈葆善。

陈葆善世居瑞城锦湖里，弱冠为县学诸生，因病不事科举，改学医于陈虬。经10年研精覃思，矻矻以求，终成最负时望的名医。他在医学理论及临床实践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可谓博大精深，是利济医院与医学堂中仅次于陈虬的重要人物。他曾治愈孙诒让的顽疾，医名传于江浙两湖间。同里的池志激对他很是钦佩，称“乾嘉以来，我随善医多读书者，蛰庐外，庵庵君为最”。陈虬对自己这位“大弟子”尤为倚重，从不以师尊自居，而是以友相待。不仅委以重任，让他总理医院并执掌教席，而且逢人总是推介称：“吾友陈栗庵院医之良也！”

陈葆善熟谙经典，平时喜博览医籍，穷究经言。他行医寻求古训而不拘泥，对医学研究也切合实际，在认识病症过程中，往往都是根据现实症候病情与治疗效应进行辨证论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寝馈既久，妙悟良多，一得之愚，颇足自信”。

《黄帝内经》是我国古代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医学经典，分为《灵枢》与《素问》两大部分，《素问》中因逸脱“秋伤于燥”一节，使得其法不传，而俞佳言、吴鞠通等人关于六淫燥气的理论，虽有发明而未详尽，不能为其发扬光大。陈葆善根据自己多年诊治的实践，遂著《燥气总论》，作进一步理论推阐，以弥补充实《素问》的空白。

他在书中首明本义，阐述燥邪与火邪、湿邪、寒邪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认为“燥气者，秋气也，兼火、湿、寒三气而有之也。大概初秋多火，中秋多湿，三秋多寒，虽兼有火湿寒三义，而实非正火正湿正寒可比”。次述病理，指出燥气伤人亦有感而即发和伏而后发之区别。由于太阴、阳明同为燥金，同气相求，故“燥之初入，必先于肺胃”。再详脉候，认为“凡燥气之脉，类多轻涩，盖为太阴经气被阻，气化不能宣布之故，惟兼火及热化者，肉搏少阳厥阴，间有弦数浮洪耳”。终出治法：“施以治燥气之祖方，轻则麻杏石甘汤，重则大青龙汤。”

同时，他又辑《燥气验案》2卷，共录入验案22则，以案验理，反复辩难，使之与总论互相印证，以检验其理论与实践的相统一。故时人都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其“治燥气于医学为专科，于医理为绝诣，于医术为主臬”，非深明医理、久沉医事者而不能为。

陈葆善不愧是一位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具有新知创见的医学专家。不久，他又著《白喉条辨》，以雕版面世。这是一部中医治疗白喉的专论，分为辨病源、辨经络、辨色、辨脉等15个论题，言前人所不详。尤其是他创制的专治白喉的“三炷降龙丹”相当灵验，远近仿效，多所全活，备受医家好评。该书首刊于《利济学报》，1957年以来，人民卫生出版社曾3次出版该书，并入载《中国医学大辞典》。此外，他所著的另一本《本草时义》，1931年也由上海中医书局出版。

陈葆善志趣高雅，除善医外，还好诗爱画，喜金石工昆曲，平素与吴昌硕、罗振玉、孙诒让、黄绍箕、陈虬、陈震宸、宋恕、洪炳文等名流交厚，家中常常高朋满座，弹琴吟咏，其乐融融。他另有一绝，就是善于荷花种树。当时，利济校内辟有“药园”，种植百草药物。陈葆善对花木情有独钟，有一空闲就往药园跑，与那里的专职园丁潘志雅（阿浩伯）俨然一对“秋翁”。他还著有《月季花谱》《艺菊瑣言》及《漱谿斋吟草》《曲谱》等。

1916年，陈葆善卒于家中，墓葬集云南麓西岙山之原，池志激为其撰墓志铭。其弟子胡鑫承师之学，曾协助陈虬编纂《利济元经》，后亦为瑞邑名医，当地凡有重病危症者，纷纷求其诊治。其子陈准为李笠学生，精目录学，编辑过《瑞安孙氏玉海楼藏书目录》《殷契书目》，著有《淮南子札记》《管子集注》等。